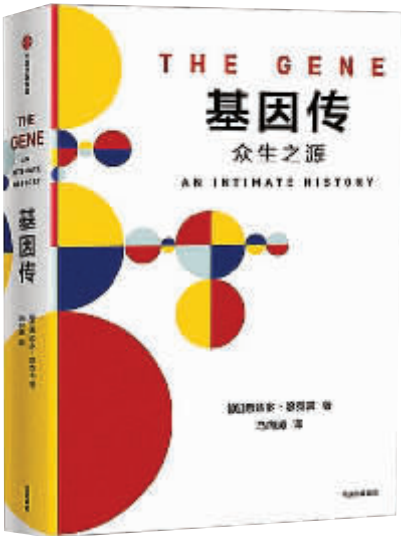


基因、伦理与人类命运

——评《基因传：众生之源》

■ 陈华文



《基因传：众生之源》
[美]悉达多·穆克吉著
马向涛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基因技术是“双刃剑”

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破解了基因的运行机制,也就破解了生命的奥秘。如今,基因测序、基因克隆等基因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完成了全部人类基因的比对与测序工作,人类的病理、行为、性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也就有了更新的答案,人类征服基因的时代已经到来。

《基因传》从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种植豌豆的故事开始,回顾人类探索基因的历程。1864年,孟德尔发现“遗传因子”,

可惜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旋即被人们遗忘。“基因”一词几十年后问世,这使得英美两国科学家希望通过操纵遗传规律来加速人类进化与解放。“二战”后,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科学家们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人类由此认识了基因。

20世纪70年代,两项对遗传学起到重要影响的技术问世,即基因测序与基因克隆,它们分别代表着基因的“读取”与“复制”。上世纪80年代,人类遗传学家开始使用这些技术比对并鉴别疾病相关基因,比如对胎儿进行筛查,若携带危害健康的突变基因,则其父母可选择终止妊娠。事实上,唐氏综合征、囊性纤维化或泰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的父母已成为基因诊断、管理与优化领域的受益者。2001年,人类基因组草图正式公布,科学家据此可从基因角度来理解人类遗传过程中的变异与“正常”行为。

科学技术如同双刃剑,用错地方就会带来巨大灾难。20世纪40年代,纳粹德国歪曲利用基因理论,制造了种族屠杀的灾难。该书第四章“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中讲到,纳粹德国打着优生学的幌子,公然推出违反人类道德底线的“种族科学”,对具有“遗传缺陷”的人们进行监禁、绝育、杀害。仅在1939—1941年间,纳粹德国就杀害了25万名身体存在遗传病或缺陷的成人和儿童。此外,纳粹德国还对众多犹太人、吉普赛人,几百万名苏联和波兰公民,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贴上各种“遗传病”标签,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任何人都拥有生存的平等权利,无论是身体缺陷或罹患疾病者,怎能

以种族与基因为由歧视,轻易地剥夺他们的生存权?这是公然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基因技术与人类命运

当前,基因测序、基因克隆、基因检测、基因诊断、基因编辑等技术正在迅猛发展,从而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如治愈疾病、预测未来,更新我们对性别、身份、选择的认知。科学家已掌握定向改造基因的技术,以影响基因功能,最终使身体状态、生理机能甚至人类本身发生改变。那么,谁有权力支配这些技术并确保安全?谁将成为此类技术的主导者,谁又会成为其牺牲品?当我们具备理解与掌握人类基因组的能力时,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概念或将改变。

还须冷静地看到,基因技术可能被用于非治疗领域,如延长寿命、改善体格与智力等。基因治疗具有巨大的潜在商业利润,其发展将受到资本的推动或影响,可能走向不可预知的方向。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确保基因治疗不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是全球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科学院近期发布消息,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诞生。从基因技术角度讲,克隆人已非难题,而从社会角度讲,这显然是法律、伦理的禁区。因此,我国早在2003年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就明确规定: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

阅读《基因传》可得到启示,包括基因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今后无论如何飞速发展,只要与人类伦理道德发生交集,就需万分谨慎、三思而行。其实,技术本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操作技术的人——威胁人类生存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类本身。

一窥晚近历史的风云变换

——读《灯火阑珊处》

■ 王振忠

档案》《民国档案》《档案春秋》《档案与建设》等专业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曾出版《远行》(散文集),编辑《百年商会》《馆藏名人少年时代作品选》《馆藏名人相册》《一个远征军的从军日记》《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和《档案中的老苏州》等,可谓成就斐然。阅读她的作品,深感其文笔细腻,刻画生动。想来也正因为如此,她对于爬梳档案的得失甘苦深有体会,故对相关学者的工作亦更具同情心。

此前,慧瑛寄来她的最新作品《灯火阑珊处》,让我有幸先睹为快。此书图文并茂,透过解密档案文献,刻画近现代的特色人物,并藉以观照宏大的社会历史。作者文笔流畅,对苏州乃至江南水乡之刻画栩栩如生,对人物的状摹,亦多能以平常心待之,娓娓道来。

时下讲述史类的著作铺天盖地,某种程度上看,这种现象反映了大众对于历史题材经久不息的浓厚兴趣。此类作品中,优秀者固

然不少,但平庸乃至庸俗者为数更多。除了那些过于严肃、通篇堆砌史料而令人难以卒读的,一些著述往往流于油滑,随意枝连蔓引,所述近乎扯淡。等而下之者,则时以“惊现”、“揭密”之类字眼夺人眼球,究其实质,不过是对“这些事儿”、“哪些事儿”鸡零狗碎般的絮叨。在我看来,有品位的文史作品,学问、趣味和文笔,三者缺一不可。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近现代史因其与当代相距较近,更能引发世人广泛的兴趣与关注。在这方面,传统史料固然不可或缺,但档案资料之利用,亦愈益受到学界重视。慧瑛于馆藏珍档中,搜之遗编断简,采之往行前言,可谓得天独厚。

慧瑛出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科班,学有渊源。她的这部作品既有对新史料之发掘与利用,又有文人妙来的表述技巧,读来可谓文实兼备、雅俗共赏。书中不少篇什令人耳目一新。譬如,《可爱可悲



《灯火阑珊处》
沈慧瑛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话芸娘》,对沈三白故事之分析颇为引人入胜,反映了作者在史料理解与文字表述上的驾轻就熟。在我看来,历史书写不能只是机械地堆砌史料,让人昏昏欲睡。好的著述应力透纸背,回溯历史场景,揆势衡情,对风俗移易与时事变迁,作设身处地之想。否则,再

精彩的事世人情,都只能是遥远

的历史掌故,无从引发读者共鸣,亦难以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我特别欣赏的是,作者的写作虽然行云流水,但言之有据,尽量避免臆断成证之论。类似的文字在文集所见颇多,毋需赘引。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以档案为线索,开展实地调查。她不辞辛苦,除了重点立足江南,还北上沈阳,西至武汉,进一步征集档案史料,走访当代名人,通过口述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例如,作者采访多位耆儒硕彦,采摭旧闻,探源竟委,撰写了《走近张充和》《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访周有光先生》等。前贤时彦的纷纷往事风流俊逸,于此概可想见……这些访谈与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档案的内涵。

综而言之,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慧瑛聚焦馆藏珍档,在信而有征的基础上,探微索隐,作人情世事之推想。如今,跟随着她所挑选出的一件件档案、一段段日记、一份份旧杂志、一通通家书,我们得以了解近现代的诸多

沈慧瑛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任职于苏州市档案馆。早年,大家忙于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疏于联络。直到年纪渐长,为重温同窗之谊,留在复旦的几位老同学曾组织数次大学同学会,彼此之间才有了更多的联系。

从专业上看,慧瑛与我有一些共同的兴趣。记得十多年前,她惠赐《苏州商会档案丛编》数册,内容相当丰富。这对我的研究颇多助益,直到现在,这套资料仍置于案头不时翻检。我知道,苏州市档案馆是非常好的公藏机构,珍藏着不少珍贵文献。不过很惭愧,我从未去过。坦诚地说,我对各地档案馆一向公私殊切,却往往因故望而却步。十多年前,我曾应邀写《我的徽州文书缘》小文,刊于《中国档案》杂志,文中抱怨某省、某县档案馆种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想到,文章刊出后,慧瑛随即发表一文,从档案管理和服务的角度,对我的抱怨作了善意的回应……当时我想,各档案馆管理者若都能如此善解人意,对学界同仁抱有同情与理解,那该有多好!

不久,慧瑛寄来她的散文集《君自故乡来》,拜读之下我才发现,她在工作之余勤于著述,成果颇丰。过去十数年间,她在《中国